

朱向东 王崇恩 王金平◎编著

晋商民居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平明閣
卷一

晋商民居

朱向东 王崇恩 王金平 编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晋商传统聚落的形态特征与可持续利用模式研究

(基金编号: 50778117)

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晋商传统建筑文化的构成体系及其再利用方式研究

(基金编号: 2006011048)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晋商民居/朱向东,王崇恩,王金平编著.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ISBN 978-7-112-10757-5

I. 晋… II. ①朱…②王…③王… III. 民居—简介—山西省
IV. K928.7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19757号

责任编辑:陈桦

责任设计:董建平

责任校对:兰曼利 陈晶晶

晋商民居

朱向东 王崇恩 王金平 编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27½ 字数:660千字

2009年3月第一版 2009年3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49.00元

ISBN 978-7-112-10757-5

(1800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自序

我国民居建筑的研究工作起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民居建筑的研究进入了高峰期。这期间,我国先后有一批优秀的专家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作出了贡献,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如彭一刚先生所著的《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年);郑光复、李玉祥等编写的《老房子》系列丛书(江苏美术出版社,1993 年);汪之力、张祖刚等主编的《中国传统民居建筑》(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年)等等。这些成果都对我们日后从事民居建筑研究有着很大的启发和影响。本次编著《晋商民居》一书,汲取了许多前辈和同行有益的研究经验。书中所涉及的内容均是我和我的同事王崇恩、王金平以及我们的部分研究生共同的成果积累,该书的编著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我想还是从我本人从事晋商民居这项研究的历史说起吧。

我本人接触并从事民居建筑的调研工作是从 1993 年开始的。1978 年年初,我有幸成为恢复高考后我国第一批高等院校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的大学生。1981 年年底毕业,我在太原工学院(现已更名为太原理工大学)留校任教。1985 年,我受学校委派,前往北京清华大学建筑系(现为建筑学院)进修学习,师从单德启先生。单先生长期从事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的教学和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研究,有着很深的学术造诣。当时正值单先生等刚刚完成安徽黄山云谷寺宾馆的设计工作,该作品优雅古朴的徽州民居风格深深地感染了我。1993 年,我跟随单德启先生前往浙江绍兴的东浦镇,参与《绍兴东浦水街保护与更新规划》编制的前期工作。在绍兴水乡,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小桥、流水、人家的真实场景,亲身体会到中国传统民居的环境魅力,感受到了民居建筑所蕴含的文化氛围。

1994 年,我和建筑系的同事王金平教授(当时是讲师)一道,考取了我校建筑学专业的研究生,开始攻读硕士学位。我二人师投同门,导师是德高望重的高钲明先生。高先生是山西人,原先在天津大学建筑系任教,20 世纪 80 年代末调回山西。高先生也酷爱中国传统建筑研究,尤其是民居建筑的研究。1987 年和 1994 年,高先生先后主持编著出版了《福建民居》

和《中国古亭》等两部中国传统建筑研究的论著，有着丰富的研究经验。在高先生的严肃教导和热情感召下，我和王金平开始了针对山西本土民居建筑的调研工作。1995年，我赴晋东南地区长治县荫城镇考察，撰写了“商业交往行为与集镇民居形态——山西省长治县荫城镇及其民居形态浅析”一文，并于1996年8月在太原市召开的全国第七届中国民居学术会议上发表（会议论文集《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第七辑于1999年由颜纪臣先生主编，山西科技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在民居建筑研究领域里走出的第一步，现在想起来当时这篇民居论文就已经涉及了“晋商”的内容。

1996年，在导师高钤明先生的带领下，我和王金平等赴晋中、晋南和晋北等地考察，收集了大量的民居、寺庙等传统建筑资料，并开始着手撰写我们的硕士学位论文。1997年，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山西传统集镇空间环境及其民居形态分析”和王金平的硕士学位论文“风土环境与建筑形态——晋西风土建筑形态分析”同时完成，并通过了毕业答辩。我毕业论文的内容主要谈了“晋商”和“民居”的关系问题。当时，我并不是想刻意地去研究“晋商民居”，只是一种机缘，让我在朦胧中闯入了曾经的山西商人劳作和生活过的聚落。在考察中，我感觉到这些商人聚落里的民居有些异样，着实不同于村落中的民居。为完成学位论文，就拿它来分析罢了。在当时，社会学界对“晋商”的研究才刚刚兴起，晋商民居的提法也不多见，但我隐约觉得，晋商民居的研究应该是一条民居建筑研究的好路子。

1998年和2000年，我和王金平先后开始指导建筑学专业的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向是高先生留给我们的老底子——中国传统建筑的技术和艺术，研究内容以山西民居和寺庙建筑为主。我们带着研究生开始在山西各地的乡村聚落中考察，并有意识地去寻找晋商聚落。2001年，我指导的第一批研究生张昕、韩卫成毕业，二人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分别是“静升王宅的空间环境与技术构成”和“西文兴村聚落形态分析”。至2005年，我们指导的研究生已有近20人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论文题目大多以晋商民居建筑研究为主。至此，我们关于晋商民居建筑的研究有了一个较好的开端。

2005年，中国古村镇保护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在山西省临县的碛口镇召开，会议通过并发表了《中国古村镇保护与发展碛口宣言》。在会议期间，我有幸认识了前来山西参加研讨会的孙大章先生。孙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建筑历史研究专家，他撰写出版了《中国民居研究》等多部学术论著，有很高的研究水平。我就民居建筑研究工作如何深入的问题向孙先生请教，孙先生非常热情地谈了他自己的一些经验体会，并且鼓励我将我们师生共同取得的晋商民居研究成果编纂整理，尽快出版。和孙先生的一席交谈大大地增强了我对晋商民居建筑研究的信心，同时也萌生了编写一本有关晋商民居内容图书的想法。

2006年和2007年，王金平申报的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晋商传统建筑文化的构成

体系及其再利用方式研究”(基金编号:2006011048)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晋商传统聚落的形态特征与可持续利用模式研究”(基金编号:50778117)先后获得成功;我和建筑系同事王崇恩讲师等合作,也承担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西省襄汾县丁村民宅保护规划”、“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山西省临县碛口镇中市街恢复设计”以及“山西省历史文化名镇代县阳明堡镇保护规划”等多项与晋商民居内容有关的横向科研项目。我们共同深入村镇考察,积累了大量的图片、测绘和文献资料,为《晋商民居》一书的编写和课题的继续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08年9月,在部分研究生同学的帮助下,我和王崇恩、王金平合作,开始了《晋商民居》一书的编写工作。

转眼年关将至,我们的努力也有了一丝可喜的回报,书稿终于完成了。然而,不知何故,事情越接近尾声,我心里反倒越来越觉得不踏实,真的有点儿“丑媳妇怕见公婆”的那种感觉。我们知识面窄、水平有限是一方面,对书中的观点是否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也很担心,唯一使我们觉得欣慰的是,《晋商民居》这本书里所举的例证全部都是真实的,这些晋商集镇和晋商村落中的民居,绝大部分至今还保存完整,值得一看。因此,怕是没有用的,“公婆”该见我们还得见。就请大家多多指正吧。

朱向东

2008年12月于太原理工大学清泽园

前言

晋商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商帮之一，号称十大商帮之首。山西商人在明清至民国初期 5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不仅创造了中国商业金融领域的辉煌，而且创造了适合他们自身生存环境的聚落及其民居形态。据统计，山西省境内保存基本完整的晋商聚落，包括集镇或小城镇、村落等，大约有 1000 多处。商业集镇或小城镇及其店铺、作坊、住居等混合式民居是商人们劳作与生活的场所，周边环境主要体现的是一种商业运营的特点；商贾村落及其民居是商人和他们的眷属生活享乐的场所，该场所主要体现出一种血缘关系和商贾意识相互交织的环境氛围。

《晋商民居》一书即是以上述这些晋商聚落中较有代表性的集镇（小城镇）、村落以及聚落民居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些晋商聚落和民居建筑形态的分析，研究探讨一组在商业运营或商贾意识环境影响下山西商人传统的生活住居模式。在书中，我们根据晋商聚落和民居的类型、特点以及我们所掌握的基础资料，组织了四个部分的内容，即晋商民居概述、商业住居环境中的晋商民居、商贾意识环境中的晋商民居以及晋商民居的保护与再利用等。这四部分的内容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

第 1 章为晋商民居概述，主要解析晋商环境与晋商民居。该部分内容以大量的晋商聚落及其民居建筑为例，归纳总结了晋商聚落的类型，着重揭示了晋商不同类型聚落空间的环境特点及其民居建筑的形态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对应关系。

第 2 章为商业住居环境中的晋商民居，以三个不同类型的集镇聚落——临县碛口镇、代县阳明堡镇和灵石静升镇，以及这些聚落中的民居建筑为例，着重揭示在特定历史地理条件下所形成的商业集镇环境对其“混合式”民居建筑形态的影响。

第 3 章为商贾意识环境中的晋商民居，选取了四组不同商贾村落中的民居——襄汾丁村民居、太谷曹家大院、阳泉银圆山庄和沁水柳氏民居进行分析，着重揭示在村落血缘环境和商贾意识环境共同影响下晋商民居的建筑空间表现形式。

第4章为晋商民居的保护与再利用,以榆次车辆村常氏民居为例,围绕其历史和现状进行客观分析,着重讨论晋商民居保护和再利用的必要性以及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旨在探索一种统筹兼顾、协调统一的传统民居信息保存与合理利用之路,为我国历史建筑遗产的保护工作作出一些微薄的贡献。

本书图文并茂,根据内容需要采用了一定数量的照片、测绘和分析示意图等,加强了读者对图书内容的理解和对晋商民居的直观感受,值得一看。

目录

第1章 晋商民居概述	1
1.1 晋商的起源与发展	2
1.1.1 山西在历史上的商贸资源	2
1.1.2 山西的商业交通	3
1.1.3 山西的经商人群	4
1.1.4 明清时期山西商业贸易的繁荣与发展	5
1.2 晋商聚落与晋商民居	6
1.2.1 晋商聚落	7
1.2.2 晋商聚落建筑组成	11
1.3 晋商聚落与民居的影响因素及区位划分	23
1.3.1 商业运输和经营模式对晋商聚落与民居的影响	23
1.3.2 自然地理环境对晋商聚落与民居的影响	24
1.3.3 社会人文环境对晋商聚落与民居的影响	27
1.3.4 晋商环境与民居类型、区位划分	31
1.4 市居空间环境与店铺民居形态	34
1.4.1 市居区域空间特征	35
1.4.2 市居区域的景观特色	36
1.4.3 店铺民居空间形态的选择	38
1.4.4 店铺民居建筑形式的地区差异	43
1.5 坊居空间环境与作坊民居形态	47
1.5.1 坊居区域的空间本质	47
1.5.2 作坊民居形态的选择	50

1.5.3 作坊民居的建筑个性和区域特色	52
1.6 散居空间环境与大院民居	56
1.6.1 散居区域的形成机理	56
1.6.2 散居空间环境的构成因素	57
1.6.3 大院民居空间形态特征	58
1.6.4 大院民居的“晋商遗风”	64
第2章 商业住居环境中的晋商民居	71
2.1 水陆码头形成的晋商聚落——临县碛口镇	72
2.1.1 碛口镇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72
2.1.2 碛口镇空间布局与建筑组成	78
2.1.3 碛口古镇民居形态特征分析	90
2.2 军事堡镇演化而成的晋商聚落——代县阳明堡镇	113
2.2.1 阳明堡镇的由来和军事历史背景	113
2.2.2 阳明堡镇功能与形态的演变	118
2.2.3 阳明堡镇聚落形态的标志性景观要素	123
2.2.4 阳明堡镇商铺与民居形态分析	130
2.3 村落因市而形成的晋商聚落——灵石静升镇	149
2.3.1 静升镇乡土环境综述	149
2.3.2 静升聚落的演化历程	153
2.3.3 静升镇的构成与布局形态	160
2.3.4 院落空间形态的扩展与演化	170
2.3.5 院落空间形态的变异	181
2.3.6 静升王家大院建筑	192
第3章 商贾意识环境中的晋商民居	225
3.1 晋商沿河聚落民居——襄汾丁村民宅	226
3.1.1 丁村的自然与人文背景	226
3.1.2 丁村聚落形态和空间特征	229
3.1.3 丁村民居建筑	241
3.1.4 丁村民居的装饰分析	256

3.2 晋商堡式大院民居——太谷曹家大院	263
3.2.1 曹家大院的自然环境与人文历史	263
3.2.2 曹家大院的空间布局与民居建筑形态	265
3.2.3 曹家大院的建筑审美特征	285
3.3 晋商山地聚落民居——阳泉银圆山庄	302
3.3.1 阳泉官沟村张氏及其银圆山庄	302
3.3.2 银圆山庄的布局特点	305
3.3.3 银圆山庄的民居建筑形式	312
3.3.4 银圆山庄的空间组织与形态特征	317
3.4 晋商血缘聚落民居——沁水柳氏民居	338
3.4.1 建筑——村落——血缘文化	338
3.4.2 西文兴村与铁炉村血缘关系探讨	339
3.4.3 西文兴村与铁炉村布局与功能形态比较	343
3.4.4 西文兴村与铁炉村民居建筑形态特征比较	355
 第4章 晋商民居的保护与再利用——榆次常氏民居	379
4.1 晋商巨贾常氏及其文化背景	380
4.1.1 常氏家族文化背景	380
4.1.2 常氏的儒商理念	384
4.1.3 常氏家族的晋商底蕴	386
4.2 常氏民居原始形态及其演变	387
4.2.1 常氏民居建筑空间特点	387
4.2.2 常氏民居建筑形态	394
4.2.3 常氏民居装饰艺术	395
4.2.4 常氏民居发展历史	399
4.3 常氏民居现状分析	401
4.3.1 常氏民居空间形态现状	401
4.3.2 常氏民居建筑形态现状	406
4.3.3 常氏民居装饰艺术现状	408
4.4 常氏民居保护与利用中一些问题的探讨	411
4.4.1 建筑空间形态的重组	412

4.4.2 建筑的“修复”	414
4.4.3 建筑环境的再造	415
4.4.4 常氏民居独特建筑价值重点的转移	417
4.4.5 周边环境的改变和利用问题	417
4.5 几点启示	420
4.5.1 对原有遗存建筑所作的保护	420
4.5.2 常氏民居旅游经营理念	420
4.5.3 常氏民居开发模式的弊端	420
4.5.4 今后开发模式之建议	422
主要参考文献	424
后记	427

晋是山西的简称,山西在历史上曾是古晋国的属地。公元前11世纪,西周王朝实行分封,周成王姬诵将征讨得来的一块领地——唐(夏墟唐尧后裔古国)封于其母弟姬虞,即唐叔虞。山西太原的晋祠就是为纪念唐叔虞而修建的祠庙。叔虞之子燮父即位之后改唐为晋,从此称晋国。晋商指山西商人,尤指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据文献记载,自春秋时期晋商在中国即有一定影响,从春秋至元朝末年,晋商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比较重要的商帮。明清时期,晋商开始全面崛起,并逐步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

晋商民居泛指山西商人生活、居住的处所,特指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居住处所的历史遗存。山西商人与其他各地的商人一样,大多数都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创业历程。他们在本地或外埠经营生意,修筑商铺;会聚同乡,修建会馆;捐献资金,建造庙宇,等等。事业有成,荣归故里,山西商人便在家乡修建豪宅,享乐田园生活。至今,山西境内仍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经营过的集镇和居住过的村落,保留着许多巨商富贾们精心营造的深宅大院。

1.1 晋商的起源与发展

在历史上,区域经济的崛起须具备三个重要条件,即资源、交通和商人。资源指地方的经济资源,也是区域经济贸易的资本。交通是区域对内对外经济贸易的脉络,是地区与地区之间资源往来的通道。商人则是区域经济贸易活动的直接发起者、参与者和受益者,商人在地方之间经济资源往来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另外,区域经济崛起也需要一定的机遇。例如,朝廷适时颁布的一些政令,地方上的需求信息等。

1.1.1 山西在历史上的商贸资源

在历史上,山西境内的自然资源较为丰富,其中首推盐、煤、铁等矿产资源。运城盐池的“河东盐”,早在西周就已经被开发利用,战国时期有了发展。运城盐池是古代湖泊的遗址,位于山西省西南部运城盆地之最低处,湖面海拔320米。《新唐书·食货志》载:大历年间,盐池每年税收达到150万缗,占全国盐利收入的1/4,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8。《宋史·食货志》载:庆历年间,盐池的潞盐产量达37.5万大席,每大席重220斤,合盐8250万斤,达到了空前的水平。^①唐、宋时期,河东盐已经销售到了今天的河北、陕西、河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地。

山西在历史上还蕴藏着丰富的铜、铁矿产资源。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首山即山西南部的首阳山,……在“蒲州老城南”。这说明,早在黄帝时期山西就掀开了铜矿开采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铜矿在山西境内的分布为:悬瓮山(今太原)、少山(今昔阳)、白马山(今盂县)、鼓鐙山(今垣曲)和淝山(今蒲县南)等地。^②

山西境内铁矿资源丰富,南北皆有,以南部开采为多。明代以前山西的冶铁业在全国占

有重要的排名。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命置铁冶官所，凡一十三所。每所置大使一员，秩正八品；副史一员，秩正九品”。全国共有13所，山西就占有5所，即“山西平阳府吉州富国、丰国二冶；太原府大通冶；潞州润国冶；泽州益国冶”。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由于撤销了冶铁所，变官冶为民冶，山西的冶铁业有了更大的发展，铁货产量成七八倍的增长，铁矿产地也遍布省内晋城、长治、太原等31县。^⑤

山西的煤炭资源驰名中外。煤炭的开发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唐以降，煤炭的开采已经非常普遍了。在古代，由于受到道路和交通工具的限制，山西的煤炭不能大量外运，主要用于就地燃烧加工地方产品，如炼铁等。山西省长治县荫城镇是明清时期铁货交易的主要集散中心。当地百姓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荫城铁、荫城碳，离开荫城不能干。”这充分反映了煤炭资源对于地区经济的重要性。

另外，山西历史上还有较为丰富的森林资源，传统农业和手工业也比较发达，这些都为晋商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2 山西的商业交通

路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早在远古时代，人类为了寻求美好的生存环境，“劈山通道，剡木为舟”，秦汉的驰道，大唐的贡路，宋元的驿道，明清的官路等，均为我国各朝各代各个区域之间的人员交流、物资交流、文化交流以及信息交流等各项文明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为沿路的聚落由封闭落后的农耕部落走向开放进步的文明城镇提供了先决条件。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境内山峦叠嶂，沟壑纵横，起伏的山川河谷无形中把这块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分割成了一个互相隔绝的区域。《读史方輿纪要》对山西的地势是这样概括的：“山西之形式，最为完固……。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勾注山、雁门关）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均在山西南部，统称中条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汾河、浍水）芸流而右，漳、沁（漳河、沁水）包络于左，则原隰（低下的平原地带）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山西凭借这种优越而险要的地理形势，对内可以致力发展生产，对外可以攻守兼备。春秋时期的晋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五霸之一，这与其所占据的这块有利地势是分不开的。^⑥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和区域界线逐渐被打破，区域之间渴望交流，山西与外界也需要沟通，因而连通这些区域，或通向境外之道路交通的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也在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在位期间，就采取了“轻关易道，通商宽农”（陈鸿彝《中华交通史话》）的政策，即减轻关税，平整道路，开设商贸，宽待农夫。“晋文公欲修霸业，乃赂

诸戒开道，以匡王室”，解除了来自北方戎狄的后顾之忧，继而向东南打通了晋国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并因此而成就了霸业。晋国与秦国也因水路的“泛舟之役”而结盟，成为“秦晋之好”。

千百年来，山西民众为该地区道路交通的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到明清时期，这里已经形成了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大型交通网络——东出娘子关通京城，南下黄河走洛阳，西过蒲津去西安，北跨长城接塞外。这样的道路交通格局从明清时期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中叶，时至今日也有许多道路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修建的。

道路的通顺，给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保障，增加了区域物资与信息的交流，特别是山西连接京城北京与古都西安的通道，是全国交通网络上的一条重要道路，对带动山西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沿线都市和乡村是直接的受益之地，经济都很发达。特别是集中在山西南线的一些古都，如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晋国绛州（今山西曲沃）等地，历经数千年，经济仍然兴盛不衰，其原因就在于作为这些地区经济命脉的道路交通始终在运营着。

1.1.3 山西的经商人群

“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像的那些地区，而竟是山西！”明清时期，“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其最高总部大都在山西的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在其随笔《山居笔记》中的感叹之词道出了山西商人当年的荣耀和辉煌。

历史上商人通常被视为市井之徒，故史书中少有记载。而且，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之下，商人这一社会阶层总是被作为置道德与良知于不顾，拜金思想浓厚的典型。商人见利忘义的鄙陋行为和挥金如土的奢靡生活被大肆地渲染。绫罗绸缎、山珍海味、雕梁画栋、妻妾成群似乎成了商人的写照。然而，很少有人提及商人艰辛的创业之路。殊不知，资本的原始积累是极为艰苦和残酷的。很多商人最初以一副担子、一辆推车起家，他们在酷暑与严寒中挣扎，为赚取一点蝇头小利而离妻别子，长途跋涉，少则二三年，多则数十载。更有迫于宗族势力而行商者，致富后，又多受乡党剥削，到头来竟一文不名（王兆祥和刘文智《中国古代的商人》）。商人所选择的，是一种富于竞争的生存方式；商人所行进的，是一条充满挑战的坎坷之途。

山西商人就是这样艰难走过来的。历史上，在各朝各代，各个地区都能依稀找到一些山西商业活动的迹象，如商代，“保德林遮峪相当于商代后期的墓葬中曾发现铜贝 109 枚，海贝 112 枚”（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第一辑》）；战国，上党“有城市邑十七”。邑中一般“市列成行，店铺林立”（引自《史记·赵世家》），等等。关于山西商人的详细记载，也多见于史书，如《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载春秋时期晋国猗顿，在山西猗氏一带经营畜牧